

Doi:10.11835/j.issn.1008-5831.pj.2024.07.001

欢迎按以下格式引用:周卫民.共同富裕目标下民生类公共品供给方式评价与选择——基于实证分析的新分类[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6(1):282-295. Doi:10.11835/j.issn.1008-5831.pj.2024.07.001.



Citation Format:Zhou Weimin. The evaluation and selection of the supply mode of social livelihood public goods under the goal of common prosperity: A new classification based on empirical analysis[J]. 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26(1): 282-295. Doi:10.11835/j.issn.1008-5831.pj.2024.07.001.

# 共同富裕目标下民生类公共品 供给方式评价与选择 ——基于实证分析的新分类

周卫民<sup>1,2</sup>

(1. 鲁东大学 商学院,山东 烟台 264025; 2. 北京大学 经济学院,北京 100871)

**摘要:**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意味着当前阶段我国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过程是要让公众全面共享多样化的公共产品,因此有效满足公众的公共品需求是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的一个重要内容。笔者基于我国31个省级地区相关面板数据,计量分析社会民生类公共品对于公共需求缺口、一般公共支出占比等变量的影响,根据实证结果和民生类公共品的自身特征,把社会民生类公共品区分为两种新的类型:公共需求缺口不扩大型和公共需求缺口扩大型公共品。前者的特征在于政府为这部分公共品预算财政支出和财政收入维持基本平衡,但会加大政府一般公共支出,如养老保险和社会救助支出等。后者的特征在于政府为这部分公共品预算财政支出会超出财政收入,但不会加大政府一般公共支出,如资源环境和医疗卫生支出等。从两种类型与一般公共支出的关系可以看出,前者较后者更具有公共品即由政府提供的特性。基于对两种类型公共品供给主体及其关系的深度评价和剖析,并以疫情防控过程中医疗卫生等公共品供给情况为例,提出对于前者可考虑主要选择第三方部门提供,后者则主要由市场中的企业提供。笔者把民生类公共品根据实证结果分为两大类型,对于选择公共品供给主体等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有益启示,根据公共品不同特征进行分类有助于选择合适的公共品供给主体和供给方式,进而提高公共品供给效率,促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对于民生类公共物品来说,市场或第三方部门如何有效参与供给,需要政府部门利用公共支出等手段根据不同公共品各自特征进行有效指引,借助强有力的政府行为切实提升公共品供给中三方力量的协同性,有效实现政府、市场和第三方部门合作式混合供给,最终解决社会民生类公共品需求问题,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其中,政府对于提供公共品的第三方部门应该给予足够的

基金项目: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收入增长势能视角下山东结构性改革的原因与优化路径研究”(ZR2021MG030)

作者简介:周卫民,博士,鲁东大学商学院教授,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访问学者,Email:zhouweimin2018@163.com。

财事权以支持其发展,对于市场中企业所提供的公共品应设定明确的标准和规范。

**关键词:**共同富裕;公共产品供给;公共产品分类;非营利组织(NPO)

**中图分类号:**F812.4;D630;C91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26)01-0282-14

## 一、问题提出

党的二十大报告特别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现代化建设以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sup>[1]</sup>。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指出,“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必须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sup>[2]</sup>。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更是强调,要“优化政府投资结构,提高民生类政府投资比重,高质量推进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项目建设”<sup>[3]</sup>。新时代以来社会主义重大理论创新包括做好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都特别强调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sup>[4]</sup>。实际上,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一直致力于完善公共服务政策制度体系,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在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类公共品领域不断完善公共品供给,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持续用力,努力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在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指引下,不断实施“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中国人经济发展战略<sup>[5-7]</sup>,不断促进共同富裕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

然而,随着我国民生类公共品需求快速增长,民生类公共品供求不均衡问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目标的实现。显然,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其中就包括要恰当处理好民生类公共品供求不均衡关系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sup>[8]</sup>,共同富裕正是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实现人民公平正义价值观的共同期盼和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sup>[9]</sup>。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的目标。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作了系统阐述,并把“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六条路径之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转化,其中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六个突出问题就包括“民生保障存在短板”,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依靠高质量发展,使整体经济水平和收入水平达到更高层次的富裕,同时实现更大程度的共享,包括发展成果、发展机会和公共服务的共享等。处在中国共产党“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交汇的重要历史关口,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共享理念实质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的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sup>[10]</sup>。在共享发展中推动共同富裕,才能充分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有效增强发展动力,巩固和厚植党长期执政的群众基础。为此,2021年底国务院正式批复《“十四五”公共服务规划》,将持续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

当前,我国民生类公共品需求快速增长,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主要症结实质上就在于民生类公共品面临供给总量不足、结构不均衡和效率低下等问题,有效解决民生类公共品供求失衡问题有助于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形成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最终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基于此,本文尝试探讨民生类公共品供给方式及其供给效率问题,为实现

共同富裕目标、发展新质生产力,寻求恰当处理好民生类公共品供求关系问题的有效途径。

## 二、相关文献综述

推进共同富裕要求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各个方面全面进步,在社会领域要构建一个公共服务均等、社会治理有效的社会<sup>[11]</sup>。在党中央共同富裕思想引领下,学者们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比如:对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逻辑与路径进行思考<sup>[12]</sup>;谢地等探究了共享发展理念与共同富裕之间的关系<sup>[13]</sup>;焦长权等认为民生保障建设正是有效回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迈向共同富裕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sup>[14]</sup>;黄泰岩等认为有效推进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必须把工作重点放在保障低收入者增收上<sup>[15]</sup>。此外,李实等认为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有助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动共同富裕目标实现<sup>[16]</sup>;刘俊显等在分析中国式现代化赋能共同富裕的当代实践中,特别强调从现代化社会建设方面,通过教育、医疗、养老和住房等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来助力共同富裕目标实现<sup>[17]</sup>;张来明等认为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要着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sup>[18]</sup>;奚哲伟等认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在深入分析县域基本公共服务短板问题的基础上,他们提出深化公共财政改革,引导市场与社会多元供给;以居民需求为导向,优化供给与需求匹配等对策建议<sup>[19]</sup>;翟绍果等分析了社会保障从城乡统筹到助推共同富裕面临着医疗卫生资源约束、社会保险待遇差距、社会救助水平不足以及社会福利支出短板的现实挑战,认为促成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省级统筹,是社会保障发展的必要举措,也是以民生建设推进共同富裕的可行路径<sup>[20]</sup>;李志等分析了乡村人力资源服务需求侧发展不充分,存在客观需求与主观使用意识错位的问题<sup>[21]</sup>;唐高洁分析了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和公共转移支付政策的改革在促进共同富裕实现过程中取得的成效,认为增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公共转移支付支出,提高覆盖面比增加给付水平更有助于实现共同富裕目标<sup>[22]</sup>。

共同富裕实质是一个动态发展的概念,随着人民财富水平的不断增加,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在先进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上主要表现为追求美好生活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为了有效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共同富裕将更多体现为全方位和全领域的共享。其中包括通过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健全公共服务体系、完善公共服务政策保障体系等改善人的全面发展环境,从而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丰富化、多样化的需求<sup>[23]</sup>;范从来主张以益贫式增长方式落实共建共享实现共同富裕,并指出提高保障水平和改善民生是其中一条重要途径<sup>[24]</sup>;万海远认为未来促进共同富裕的重点是进一步发挥政府区域间的横向协同作用,使财政资金更多向欠发达地区、薄弱环节和关键领域倾斜,逐步建立统一的基本公共服务标准<sup>[25]</sup>。此外,李军鹏指出全面富裕是共同富裕的一个核心内涵,衡量全面富裕的主要指标中就包括公共服务体系完善程度相关指标,具体体现在公共教育、公共医疗卫生、社会保险、环境保护等公共服务体系是否制度完备、法制健全、全面覆盖、标准合理等<sup>[26]</sup>;刘培林在构建共同富裕的测度指标体系中,把人均基本公共服务支出的城乡差距、基本公共服务绩效(升学率、疾病治愈率等)的城乡差距当成两个重要指标<sup>[27]</sup>;刘渝琳通过实证研究,建议关注结构改善和民生投入,提高社会保障和社会公共物品的供给,如加大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覆盖力度,加大在教育 and 医疗等民生领域的财政支出,减少居民因个人防御所导致的福利损失,实现共同富裕<sup>[28]</sup>。

从上述文献可以看出,当人民收入水平增长到一定阶段以后,共同富裕侧重表现为让民众享受更多样化、更全面的公共服务,因此要增加公共物品的供给,不断满足人民对公共物品快速增长的多样化需求。然而,我国在教育、医疗、养老、社会保障和环境保护等民生类公共品供给方面依然存

在严重的供不应求、供给失衡等问题。因此选择有效的公共物品供给主体、合理安排公共物品供给方式,有助于解决社会民生类公共物品需求缺口,这对于实现让民众共享公共服务的共同富裕目标尤为重要。上述文献也从民生建设的不同角度研究了公共品(公共服务)供求与共同富裕目标实现之间的关系,重视政府购买及市场和社会对于公共服务的多元供给,强调供需匹配,认为提高公共支出效率有助于共同富裕目标实现,但如何提高公共服务支出效率,特别是在民生类公共品供给中如何提高供给效率,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江亚洲指出运用第三次分配推动共同富裕的制度与机制主要在于培育社会慈善主体,积极引导社会主体参与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等<sup>[29]</sup>。可见,不断培养和发展包括非营利组织在内的社会力量、优化公共品供给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重要内容。而公共品本身特性使得公共品供给存在“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可能,这客观上要求第三部门包括民间非营利组织介入,公共品供给主体可以在政府、市场和第三方三者之间选择。

有关公共物品供给主体,国外学者 Weisbrod 认为第三部门的出现是市场失灵和政府公共物品供给不足的结果,它被视为一支独立的第三方力量在公共物品提供上实现公平与效率的最优结合,同时也在防范政府与私营部门对公众利益的侵害方面具有重大意义<sup>[30]</sup>。Hansmann 主张通过非营利组织提供公共物品,认为“契约失灵”是非营利组织兴起的原因,非营利组织由于必须受到“非分配约束”,它不会为追求利润而降低品质,由非营利组织供给公共物品,生产者的欺诈行为便会得到有效遏制<sup>[31]</sup>。Wuthnow 提出了政府、市场、自愿部门三方提供公共产品供给模式,并指出政府、市场与第三部门在解决同一社会问题时存在着密切关系,在公共物品提供中也会存在激烈的竞争<sup>[32]</sup>。奥斯本认为在西方国家公共服务改革过程中要引入市场机制来改进公共服务供给机制,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效率<sup>[33]</sup>。萨拉蒙也认为非营利组织已经成为与政府、市场相区别而又相互关联的主要经济、政治和社会力量,构成了当代社会“金三角结构”的主要支柱,是维护社会公正的平衡器<sup>[34]</sup>。国内学者从功能角度把公共产品分为三类。其中一类是民生保障类公共产品或社会性公共服务,即政府提供的促进社会发展的公共服务,主要包括教育、科技、文化、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韩保江、韩心灵认为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意义远不只是为了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因为公共产品具有正外部性或外溢性,如果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二者投入比例适当,随着公共产品供给总量增加和结构完善,公共产品投资的社会收益率将超过私人部门收益率,从而会导致经济呈现出更高的实际增长率,公共产品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被定义为“公共产品余值”并加以实证分析<sup>[35]</sup>。黄利文、沈晖认为社会性公共服务具有基础性意义,具有公民权利的性质,涉及范围广泛,由此建议在设计公共品供给规制路径时政府应保持两个以上竞争者并允许公共机构及非营利组织参与竞争,以便消费者可以进行不同的选择<sup>[36]</sup>。李玉双提出大国公共产品存在供给优势<sup>[37]</sup>。李稻葵认为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点在于提供公共产品<sup>①</sup>。虽然我国作为大国具有供给数量上的优势,即公共品供给数量庞大,但相对于人民日益增长的公共品需求来说,教育、医疗卫生和养老等方面的公共服务供给仍然存在较大的缺口。因此,为了新阶段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有必要充分考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选择和供给方式等问题。正如冷功业指出非营利组织因具有贴近基层、灵活创新、效率公平相结合的优势使其为公众提供公共物品具备主观依据。公民需求向多样化、个性化和法治化转变,伴随整个社会的发展与进步,社会公众越来越注重高质量公共物品的多样性。多元化的社会需求正在大力推动政府改变公共物品供给的单一性<sup>[38]</sup>。

① 参见: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2013年6月15日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的演讲。

对于类型庞杂的民生类公共品来说,市场或第三方部门如何有效参与公共品供给,需要政府部门利用公共支出等手段根据不同类型公共品各自特征进行有效指导。对于民生类公共品供给主体应该如何选择?如何提高公共服务支出效率和民生类公共品供给效率?基于对最新理论文献和我国现实的综合分析,本文认为应该区分不同的民生类公共品类型,在此基础上结合对我国实证数据的分析,探析解决这一问题的有益思路。本文可能的创新在于:在实证分析过程中发现不同类型民生类公共品供给对公共需求缺口、一般公共支出占一般预算支出比重两个被解释变量影响的系数正好相反,据此把社会民生类公共品区分为两种新类型,在此基础上评价并提出社会民生类公共品供给方式选择思路,为提高公共服务支出效率、促进新阶段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探索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提供参考与借鉴。

### 三、公共需求快速发展下公共品供求缺口的影响因素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具体体现在人们消费和享有越来越良好和充足的公共物品和服务,不断满足公众的公共品需求是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的题中之义,也是发展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的必然要求。当前,社会公共产品和服务表现出严重的供不应求,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因为公共产品供给的不充分不均衡而难以实现,这作为社会主要矛盾的一个核心问题,若不妥善加以解决会制约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因此,对不同类型的公共品,在政府、市场与第三部门三者之间选择合适有效的供给主体和供给方式,既有助于解决公共品供需失衡问题,也有助于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特别是新冠疫情暴发之后,在公共卫生、医疗等方面的需求出现大幅度增长,仅仅依靠政府无法满足各种防疫需求,我国抗疫取得的巨大成功离不开志愿者等第三部门所提供的各种公共服务。虽然疫情发生是一个偶然事件,但对于公众长期的公共品需求来说,偶然事件发生有一定必然性,解决公共品长期供求问题必须考虑市场和第三部门的作用。

#### (一)我国公共产品需求和供给的现实状况

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进程的推进和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公共需求全面超速增长,公共产品供给并不能满足我国居民全面快速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供给总量不足的情况日益凸现在包括养老、医疗、环保、卫生、文化等方面。与这些公共需求相关,政府在公共支出方面作出了一定的财政预算安排,从政府的公共财政支出数据可以看出公共品供求状况的变化。本文借鉴韩保江等的分类方法,把公共支出分为三种类型即维护性公共服务支出、经济性公共服务支出、民生类公共服务支出。其中,社会民生类公共支出主要包括教育、科技、文化、医疗、环保、社会保障等方面支出。他们根据国家统计局当前使用的财政支出项目,把公共产品支出分为一般公共支出、社会民生公共支出和经济建设公共支出三类<sup>[35]</sup>。

本文按照以上分类方法,在国家统计年鉴关于国家财政支出的数据中,把国家财政教育支出、科学技术支出、体育与传媒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医疗卫生支出、环境保护支出数据加总得出社会民生类公共支出数据,据此计算社会民生类公共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例,2007—2020年社会民生类公共财政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例如图1所示。由于2007年起财政支出采用新的分类指标,财政收支科目实施了较大改革,特别是财政支出项目口径变化很大,与往年数据不可比,因此本文选取2007—2020年期间数据作为样本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图1显示历年社会民生类支出占比呈现明显上升趋势。图2是其间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比重,图2显示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占比呈现明显下降趋势。2007年我国一般公共服务支

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17.1%,2013年下降为9.8%,2014—2020年间均值约为8.2%。一般公共服务支出主要用于保障机关事业单位正常运转,支持各机关单位履行职能,保障各机关部门的项目支出需要等。由图可见,在一般公共服务支出比重逐年下降的同时,社会民生类公共支出比重却逐年快速增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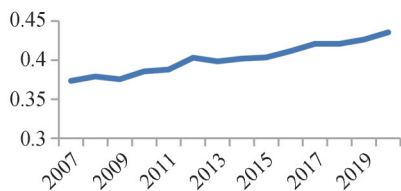


图1 社会民生类公共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比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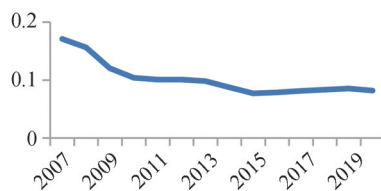


图2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比例

图3是我国各地区地方一般公共支出在一般预算支出中的数据变动情况,由此可见,我国各地区一般公共支出在一般预算支出中的比重全部呈现下降的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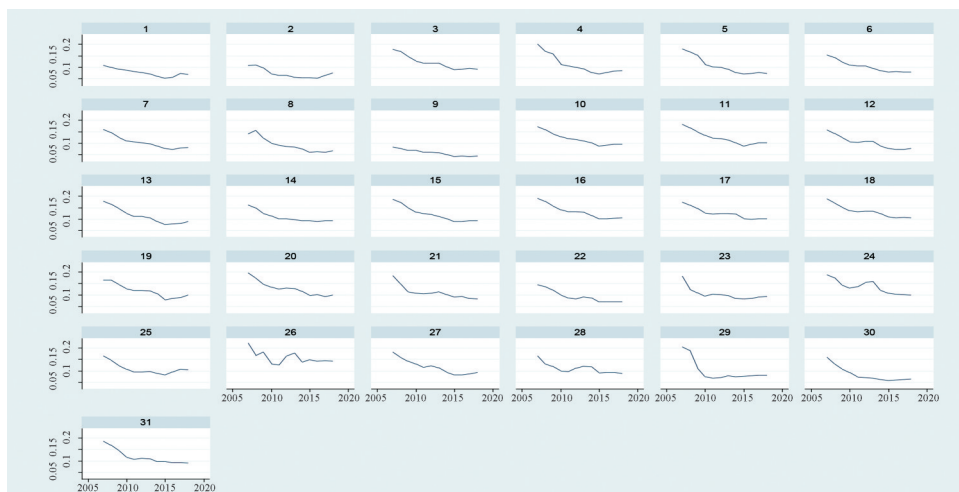


图3 地方一般公共支出在一般预算支出中的占比

注:图中1—31为省市序号,依次表示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此外,在国家统计局数据库中,由于国家财政教育支出、科学技术支出、体育与传媒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医疗卫生支出、环境保护支出等数据,2022年多数指标缺失,2021年也有少数指标缺失,故本文样本数据统一使用2007—2020年间数据

## (二)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面对日益增长的社会民生类公共服务需求,政府的公共支出显得越来越不足,为此有必要提高政府公共支出的效率,本文试图利用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以便为提高政府公共支出效率提供有益思路。实证分析中,被解释变量主要选择公共产品需求缺口、基本公共产品需求变动等。其中,公共需求缺口用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减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度量。如此处理的原因在于:在宏观经济总量核算中,社会总需求包括各项支出,而社会总供给包括各项收入,国家公共财政支出是政府为市场提供公共服务所安排的支出,财政支出的主要流向是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因此一定程度上用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减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可以基本度量公共需求缺口。而基本公共产品需求变动情况用一般公共支出比一般预算支出度量,以上数据显示一般公共支出逐年缩减而社会民生类公共产品支出逐年增加,因此一般公共支出比一般预算支出的变动情况一定程度上

度量了社会民生类公共品需求变动的情况。在核心解释变量的选取过程中,考虑到可以市场化或者能够通过第三方提供的公共产品应该是准公共产品,即民生保障类公共产品或社会性公共服务,即政府提供的促进社会发展的公共服务,主要包括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同时受数据可获取性的限制,主要选择养老保险、社会救助、城市设施水平、教育投入、资源环境和医疗卫生等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变量的数据处理和变量的统计性描述特征如表1所示。

表1 模型变量统计性描述

变量性质	变量符号	变量名称	处理方法	均值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revegap	公共需求缺口	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减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亿元)	1 612.7	107.2	5 796.5
	pubfina	基本公共产品需求变动	地方一般公共支出/一般预算支出	0.110 2	0.041 9	0.221 3
解释变量	pens	养老保险	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万人)	1 627.6	78.3	5 082.5
	socia	社会救助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万人)	55.7	2.9	189.3
	cityfa	城市设施水平	每万人拥有公共交通工具(标台)	11.5	3.99	26.55
	enviro	资源环境	生态建设与保护本年完成投资(亿元)	5.9	3.37	196.6
	medi	医疗卫生	卫生机构床位数(万张)	21.2	0.84	60.85
	educa	教育投入	教育经费(亿元)	542.4	8.16	3 860

本文选取2007—2020年我国31个省级(自治区、直辖市,未包括我国港、澳、台地区,后同)样本数据进行计量分析。上述各个变量的原始数据来源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历年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年鉴、中国第三产业统计年鉴和各地统计公报等,本文进行了相应的计算和整理。在使用省级面板数据分析各类民生类公共产品需求对于公共产品需求缺口的影响中,首先对面板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数列不存在单位根,说明数据具有平稳性。在此基础上进行协整检验,协整检验结果表明变量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限于篇幅,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结果此处没有列出)。因此可以在此基础上进行回归。在面板数据模型形式的选择上,通过采用F检验和Hausman检验决定选用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模型设定如下:

$$Y_{it} = \alpha_0 + \alpha_1 pens_{it} + \alpha_2 socia_{it} + \alpha_3 cityfa_{it} + \alpha_4 enviro_{it} + \alpha_5 medi_{it} + \delta_i + \mu_t + \varepsilon_{it} \quad (1)$$

其中, $i$ 表示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t$ 表示年份。在式(1)中, $Y$ 是被解释变量,在不同的模型①和②中分别代表公共需求缺口(revegap)和基本公共产品需求变动(publicfina)。解释变量为社会民生类公共产品需求的各个方面,具体包括养老保险(pens)、社会救助(socia)、城市设施水平(cityfa)、资源环境(enviro)和医疗卫生(medi)等。其中,养老保险使用各地的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万人);社会救助使用各地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万人);城市设施水平使用各地区每万人拥有公共交通工具(标台);资源环境使用各地的生态建设与保护本年完成投资(亿元);医疗卫生使用各地卫生机构床位数(万张);教育投入使用教育经费(亿元)等数据系列分别表示。

从模型①和②的计量结果中的系数值看(表2),解释变量养老保险(pens)和社会救助(socia)与被解释变量公共需求缺口(revegap)负相关,与基本公共产品需求变动(publicfina)正相关。而解释变量城市设施水平(cityfa)、资源环境(enviro)和医疗卫生(medi)与被解释变量公共需求缺口(revegap)正相关,与基本公共产品需求变动(publicfina)负相关。面板数据回归结果中以上各相关系数均在5%以上水平显著。在计量过程中,用教育经费替代的教育投入变量在两个模型中结果均不显著而

被剔除。在模型①中,上述解释变量中资源环境和医疗卫生方面的公共需求会显著加大公共需求缺口,特别是医疗卫生其系数在1%水平显著,且系数值较大,因此要高度重视解决社会民生类中的医疗卫生公共需求。在模型②中,养老保险和社会救助需求的增长会提高一般公共支出的比重,而城市设施水平(cityfa)、资源环境(enviro)和医疗卫生(medi)的需求增长不会带来一般公共支出比重增加。在一般公共支出与社会民生类公共支出可能存在此消彼长趋势条件下,这一结果也表明城市设施水平(cityfa)、资源环境(enviro)和医疗卫生(medi)的需求增长会带来社会民生类公共支出的增长。

表2 计量结果

变量	revegap(公共需求缺口)	publicfina(基本公共产品需求变动)
	①	②
pens / ln_pens	-0.3466 (0.1124)***	0.0264 (0.0042)***
social / ln_social	-5.7087 (1.4759)***	0.0062 (0.0019)***
cityfa / ln_cityfa		-0.0205 (0.0068)***
enviro / ln_enviro	0.00029 (0.000118)**	-0.0039 (0.0019)**
medi / ln_medi	102.2615 (7.9408)***	-0.0334 (0.0048)***
常数值	497.42 (170.52)***	0.0850 (0.0359)**
R <sup>2</sup> (within)	0.8478	0.4895
R <sup>2</sup> (between)	0.3636	0.3696
R <sup>2</sup> (overall)	0.4357	0.3742
F 检验值		
Wald 检验 p 值	0.0000	0.0000
Hausman 检验值(P 值)	$\chi^2=-4.98$	$\chi^2=-182.39$
观测值	279	279
组数	31	31
备注	RE	RE

注:(1)括号中的数字为标准差;(2)\*\*、\*\*\*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为5%和1%;(3)FE估计的Hausman检验的零假说是FE与RE估计系数无系统性差异;(4) $\chi^2$ 为负时取随机效应;(5)在②式中各解释变量使用了其对数值数据系列。由于部分变量有些数值缺失最终观测值有效数为279

在社会民生类公共需求不断增长的情况下,政府为了满足公众对社会民生类公共产品的需求必然要加大对社会民生类公共产品的供给,政府为社会民生类公共产品供给而发生的预算支出增加必然要挤占一般公共支出。同时,实证结果表明养老人数增加和低保人数增长会带来一般公共支出增长。从一般公共支出占比递减的事实中可以看出,当前政府在主动缩减一般公共支出,同时,民生类公共品需求中养老保险和社会救助这部分的需求增长却会带来一般公共支出增长,这两个方面的变化势必减少政府机关事业单位正常运转所需的支出,这也是政府在解决民生类公共品供求问题实现共同富裕目标时面临的一个困境,是值得高度重视的问题。为了保障政府机关事业单位正常运转所需的一般公共支出,政府有必要对社会民生类公共产品供给实行分类处理,以提高

公共服务支出的效率。对于类似养老保险和社会救助这部分社会民生类公共产品,其特征是这部分公共产品需求增长不会扩大公共需求缺口,即政府为这部分公共产品和服务所预算的财政支出和财政收入维持基本平衡,但会加大政府一般公共支出。而对于资源环境和医疗卫生这部分社会民生类公共产品,其特征是这部分公共产品需求会明显加大公共需求缺口,即政府为这部分公共产品和服务所预算的财政支出会超出财政收入,而不会加大政府一般公共支出。城市设施水平变量在模型①中对公共需求缺口影响不显著,在模型②中结果显著表明城市设施水平增长不会加大政府一般公共支出。

#### 四、基于实证结果对社会民生类公共品的新分类及其供给方式评价与选择

##### (一)基于实证结果对社会民生类公共品的新分类

根据上述计量结果和民生类公共产品的一般公共服务支出比重和社会民生类公共支出变动情况,本文尝试把民生类公共产品区分为两大类型:公共需求缺口不扩大型和公共需求缺口扩大型。在本文以上实证分析过程中,公共需求缺口用财政一般预算支出减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代替。其一,公共需求缺口不扩大型的民生类公共产品类型是指这种类型的公共产品需求增长不会带来财政一般预算支出超过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例如用于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人数所需的社会保险和用于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所需的社会救助等,其财政一般预算支出不会超过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产生这种状况的原因有可能是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等所致的公共产品需求的变动没有突然过快增长,这种变化在政府预算的范围内,但供给这类公共产品的政府各类机关的运转会带来一般公共支出增长。其二,实证结果表明,公共需求缺口扩大型的民生类公共产品需求增长不会带来一般公共支出增长。公共需求缺口扩大型的民生类公共产品类型是指这种类型的公共产品需求增长会带来财政一般预算支出超过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例如资源环境和医疗卫生等,产生这种状况的原因有可能是民众对生态建设与保护、卫生机构床位数的需求突然超常增长。显然,对公共品类型尝试进行新的分类并据此提出不同的供给方式,有助于解决医疗卫生等公共品的供给问题。

上述实证分析过程主要论及公共品需求与政府公共支出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民众的公共品需求不断增长,另一方面政府公共品供给能力有限。当前有限的财政资源越来越难以满足公众日益增长的公共品需求,严重制约了全面共享公共品的共同富裕目标实现。作为政府公共支出的三个主要部分,一般公共支出、社会民生支出与经济建设公共支出中,一般公共支出存在增长速度下降而社会民生支出增速明显上升之势。政府作为公共品供给主体,与市场、第三方部门之间关系,以及一般公共支出和社会民生支出之间关系,某种程度上都反映出政府在公共服务领域的治理能力,影响了公共品供给能力。本文依据实证分析中民生类公共品需求对公共需求缺口和一般公共支出占一般预算支出比重的影响,把民生类公共品分类为公共需求缺口扩大型和公共需求缺口不扩大型两种大类型,这一新的分类有助于深入认识政府与市场、第三方部门在公共品供给之间关系,以及一般公共支出和社会民生支出之间关系,从而为有效提高政府公共品供给能力厘清思路,为有效实现共同富裕目标中的公共品共享目标助力。

##### (二)不同类型社会民生类公共品供给方式评价

首先,从政府属性看中国政府具有以民为本的鲜明特征,这与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具有内在一致性。从中国一般公共支出占比不断降低、社会民生类公共支出占比不断上升的事实可以看出,政府

的根本目标在于解决社会民生公共品需求,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在推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一般公共支出呈现不断减少的态势,表明政府没有增加一般公共支出用以建立“大政府”,而是致力于建设有限、有为、有效政府。当然,政府公共支出结构的变化并不完全是政府主导的结果,也是因为公众需求因素的影响逐渐增强所致。随着经济高速发展,我国政府事实上一直在主动缩减一般公共支出,政府希望通过合理配置公共资源提供公共产品,最大限度地满足公众的公共需求。应该说,健全公共品供需匹配机制是政府实现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路径,政府治理目标选择的关键在于统筹经济发展和保障基本民生,实现公共品需求公平与效率的有机统一,政府以民为本的特征和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具有内在一致性。与西方国家不同,我国政府始终坚持以民为本,把民众的需求放在最高位置,据统计我国人均寿命增长到78.2岁,已超过美国等发达国家人均寿命水平。由此可见,以民为本的政府治理理念所形成的公共品供给体制有助于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尤其是在建立多元主体的公共品供给体系中,既要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和市场在满足异质性公共品需求中的作用,更要加强政府自身治理能力建设,提升公共品供给中三方力量的协同性,最终解决社会民生公共品需求短缺问题。

其次,从政府和市场作为公共品供给主体的关系看,对于社会需求快速扩张的公共品,政府需要探索这类公共品如何借助市场实现有效供给。例如,对于公共需求缺口扩大型的民生类公共产品,可以考虑通过产业化,建立多元供给的公共品供给体系,灵活运用市场机制参与公共品供给。对于具有排他性、生产环节和分配环节可分的公共品,政府可以借助特许经营、税费减免、特殊补贴、合同外包、建立公私合作伙伴关系等方式向公众提供。例如在医疗卫生、资源环境等领域,通过投资管理体制多元化等方式改革国有企业或事业单位,打破政府在这些领域的垄断格局,不是“以钱养事”,而是通过多种手段激励企业参与到民生需求快速增长的这类公共品供给中。

再次,从政府与第三方力量的关系看,对于弱势群体必需且离不开政府监管的公共品,政府可以考虑发挥社会组织在满足分散性、多样化、小众化需求中的作用。例如,对于公共需求缺口不扩大型的民生类公共产品,这类公共品需求不会突然增长,但是属于低收入和弱势群体必需品,需要政府相关部门长期监管。因此,可以考虑通过加强对公益类社会组织的引导,强化对社会组织的法治监管,培育社会组织的自治性与独特性,通过社会自治解决长尾性公共需求,政府主要承担社会组织失灵情况下的公共责任,为此花费的一般公共支出必不可少。对于公共需求缺口不扩大型的民生类公共产品,具有一般公共支出占比会随这类需求扩大而增长的特征。政府对于这类公共品,可以根据特定公共服务目标,通过建立契约关系,以全额购买、非全额购买、资助补贴以及项目奖励的方式将那些具有较强公益性的公共服务(如社会养老和社会救助等)交由非营利组织承担。对那些资金需求数量较少、外部性较小,容易形成一致意见的公共品,由非营利性组织发挥补充功能可以解决政府财政资源有限,难以兼顾小范围公平的问题。

第四,从一般公共支出和社会民生支出之间关系看,政府的行为选择面临民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公共需求与政府有限资源之间的矛盾,公共品供求关系的有效解决会影响社会经济发展和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相对于社会公众日益增长的公共需求来说,政府财政资源显得相对有限。而社会公共需求快速增长导致社会民生支出不断增长,一般公共支出比重不断缩减,这势必减少政府机关事业单位正常运转所需的支出,但公共需求缺口不扩大型的民生类公共产品的供给会引致更多的一般公共支出,这个矛盾的解决需要通过经济发展和提高公共品供给效率方能实现。公共服务的供给需要平衡经济发展与社会福利,单一的公共服务机制不能有效回应社会多元化需求。因此,

要建立混合的公私合作机制,在强调政府公共责任的同时,更加重视供给方式对公众的便利性。政府的治理过程实质是通过调整公共支出项目、规模和使用方式,实现公共支出供需匹配,促进公共品供需均衡。不同时期政府公共支出结构的差异,实际上蕴含着政府治理目标定位和治理方式选择的不同,显示出政府治理水平的变化,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程度由此也可以反映出来。

最后,从公共品供给主体的选择看,可以根据公共品本身的特性,对不同类型的公共品在政府、市场和第三方部门三者之间作出选择。对于交易成本低、公共利益低、偏好冲突性高、低收入群体必需,但是财力不可承受的公共品,可委托社会组织供给。而对于交易成本大、公共利益高、偏好冲突性高、低收入群体必需,财力可承受的公共品,由政府直接供给。对于交易成本大、公共利益高、偏好冲突性低、低收入群体非必需,财力可承受的公共品,考虑由市场提供。当公共品交易成本高、公共利益性强、具有异质性偏好,而且生产与供给在技术上难以区分,则需要政府通过财力来直接生产和提供。对那些具有同质性偏好,供给与社会公平关联较小、生产与供给环节可分离的公共产品,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可以降低成本提高公共支出效率。由此可见,根据公共品不同特征进行分类有助于选择合适的公共品供给主体和供给方式,提高公共品供给效率,有助于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当然,本文把民生类公共品根据实证结果分类为公共需求缺口扩大型和公共需求缺口不扩大型两种大类型,但并不可能完全解决公共品供给在公平和效率之间的平衡问题。根据公共品不同特征,利用公共品生产与供给之间的可分性,发挥政府、市场和社会组织在不同类型公共产品供给中的作用,实现合作式混合供给有助于提高公共品供给效率,解决公共品供需失衡问题,有力促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 (三)不同类型公共品供给方式选择

数据显示,近几年我国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例没有太大变化,可以看出这一比例没有更多缩减空间。在表2的计量结果中,由模型①和模型②可以看出,在社会民生类公共服务需求中,养老保险和社会救助等公共品需求类型会增加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占比,更具有纯公共物品须由政府提供的特性,而医疗卫生、资源环境、城市设施等需求类型不会增加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占比,但会扩大财政支出与财政收入这一缺口,其中特别是医疗卫生会对扩大公共需求缺口产生非常大的作用。我国的医疗、公共卫生等方面的公共品需求发展速度很快,这部分公共服务供给面临严重不足,政府有必要深化公共卫生管理体制,对医疗、公共卫生等公共品进行严格的标准化指导,对于可以标准化的医疗卫生方面的公共品,主要借助市场力量中的民营企业予以解决。

政府对于提供养老服务、社会救助等社会民生类公共品的社会力量等第三方组织应该给予足够的财事权以支持其发展,虽然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当前并没有较大可降空间,不能通过大幅降低一般公共服务支出来增加社会民生类公共服务支出,即政府无法通过压缩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的比重进而提高社会民生类公共品供给,但在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比重维持不变的水平上,政府在一般公共服务支出总量中可以调整其内部支出结构,选择一些重点领域的非营利组织进行培育和资助,适当增加对提供养老保险、社会救助等社会力量方面的支出,凸显政府对这类公共品提供者即非营利组织的重视和认可,有助于改善这类公共品供给不足的问题。

总之,对多数公共产品来说,单独交由市场、社会组织、政府中的任一方供给均难以有效满足公众需求。根据公共品不同特征,充分发挥政府、市场和社会组织各自在不同类型的公共产品供给中的作用,实现合作式混合供给是解决公共品供需均衡问题的主流供给方式。本文认为对民生类公

公共品进行新的分类尝试,在此基础上强调使用合作式混合供给方式,并对不同类型公共品的供给主体进行合理取舍,有助于解决社会民生类公共品多样化需求问题,最终推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 五、研究总结

公共品供给方式选择实际上就是对于不同类型的公共品选择不同的供给主体,恰当的供给主体选择会有效提高公共品的供给效率。本文从分析公共需求缺口的影响因素出发,基于我国31个省级地区面板数据,实证分析社会民生类公共需求各个部分包括养老保险、社会救助、城市设施、资源环境、医疗卫生和教育投入等作为解释变量对于公共需求缺口和基本公共品需求变动等被解释变量的影响。计量结果显示出不同的民生类公共产品对于公共需求缺口、一般公共支出占比两个变量存在不同的影响和作用,据此把社会民生类公共产品区分为两大类型,即公共需求缺口不扩大型公共品和公共需求缺口扩大型公共品。

第一,根据实证分析结果及对公共品类型的新分类,深入评价和剖析政府与市场、第三方部门之间关系,以及一般公共支出和社会民生支出之间关系,可以认为我国须建立多元主体的公共品供给体系,既要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和市场在满足异质性公共品需求中的作用,更要加强政府自身治理能力建设,始终坚持以民为本的执政理念,建立和完善有效的公共品供给体制,通过强有力的政府行为切实提升公共品供给中三方力量的协同性,以解决社会民生类公共品需求问题,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第二,根据本文对民生类公共品新分类分析我国公共品的供求关系,在此基础上选择恰当的供给方式,主要在于对于公共需求缺口不扩大型民生类公共产品类型,例如社会养老、社会救助可以主要借助非营利组织(NPO),侧重于由社会服务机构等第三方力量来完成,政府对于提供这类公共品的社会力量应该给予足够的财事权以支持其发展。对于公共需求缺口扩大型民生类公共产品类型,例如医疗卫生、资源环境可以借助市场力量,侧重于由市场中企业通过市场竞争提高这类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政府对于市场中的企业所提供的公共品应设定严格标准和规范。

第三,对大部分公共品来说,为了更好实现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平衡,单独交由市场或社会组织或政府供给均难以有效满足公众需求。本文把民生类公共品根据实证结果分类为公共需求缺口扩大型和公共需求缺口不扩大型两种大类型,但并不能完全解决公共品供给在公平和效率之间的平衡问题。可以肯定的是,根据公共品不同特征,利用公共品生产与供给之间的可分性,发挥政府、市场和社会组织各自在不同类型的公共产品供给中的作用,实现合作式混合供给有助于提高公共品供给效率,解决公共品供需失衡问题。因此,根据公共品不同特征进行各种分类有助于选择合适的公共品供给方式,提高公共品供给效率,这与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过程具有一致性。

第四,不断满足公众的公共品需求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一个重要内容。国家财政支出数据显示,主要用于保障机关事业单位正常运转的一般公共服务支出比重逐年下降,而社会民生类公共支出比重逐年快速增加,这两方面数据的变化反映出我国政府一直致力于满足公共需求,推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同时也表明第三方部门在社会民生类公共产品供给中所起的作用日益重要。因此,我国需要大力发展非营利组织,以解决公共需求缺口不扩大型民生类公共产品包括养老、社会救助等公共产品的供求矛盾。

第五,我国发展非营利组织加大社会服务机构等社会力量供给公共产品的策略,最重要的一条经验是国家要完善非营利组织发展的法律法规,同时政府要给予社会服务机构充分的信任和爱护,

并认同社会服务机构等非营利组织的社会身份和社会地位,给予足够的财事权支持,促进非营利组织形成完整的发展策略和管理体系,然后在此基础上探索政府、私人企业和非营利组织三方合作供给社会公共品的有效方式。

####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 [2] 综合学习贯彻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大会发言摘编[N]. 人民日报,2024-07-31(14).
- [3]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三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N]. 人民日报,2025-10-29(01).
- [4] 黄凯南. 新时代以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大理论创新[J]. 经济学动态,2025(2):5-17.
- [5] 徐政,程梦瑶,郑霖豪. “中国人经济”的内涵辨析:理论演进、核算革命与实践路径[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6):15-27.
- [6] 陈晓仪. “中国人经济”:“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话语创新与实践取向[J]. 统一战线学研究,2026(1):110-121.
- [7] 徐光木. “中国人经济”视角下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机遇、挑战与对策[J]. 统一战线学研究,2026(1):122-134.
- [8]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
- [9] 张蕴,郭东方. 中国式现代化场域中的公平正义价值观研究:基于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角分析[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5):287-299.
- [10] 习近平. 深入理解新发展理念[J]. 求是,2019(10):4-16.
- [11] 于成文. 坚持“质”“量”协调发展扎实推动共同富裕[J]. 探索,2021(6):31-47.
- [12] 徐政,郑霖豪. 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逻辑与路径选择[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4):39-52.
- [13] 谢地,王圣媛. 基于文献计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研究述评[J]. 重庆社会科学,2022(8):21-34.
- [14] 焦长权,董磊明. 迈向共同富裕之路:社会建设与民生支出的崛起[J]. 中国社会科学,2022(6):139-160,207.
- [15] 黄泰岩,韩梦茹. 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目标、重点和途径[J].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23(4):4-12.
- [16] 李实,杨一心. 面向共同富裕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行动逻辑与路径选择[J]. 中国工业经济,2022(2):27-41.
- [17] 刘俊显,张崇旺. 中国式现代化赋能共同富裕的科学内涵、生成逻辑和当代实践[J]. 学术探索,2023(4):17-23.
- [18] 张来明,李建伟. 促进共同富裕的内涵、战略目标与政策措施[J]. 改革,2021(9):16-33.
- [19] 奚哲伟,史婵,王小林. 共同富裕目标下县域基本公共服务短板及均等化政策分析[J]. 农业经济问题,2024(2):18-34.
- [20] 翟绍果,徐天舒. 从城乡统筹到助推共同富裕:社会保障的现实挑战、制度逻辑与渐进路径[J].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3(2):80-89.
- [21] 李志,谢梦华. 人力资源服务助推乡村振兴发展研究:基于实现共同富裕目标视角[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286-298.
- [22] 唐高洁,闫东艺,冯帅章. 走向共同富裕:再分配政策对收入分布的影响分析[J]. 经济研究,2023(3):23-39.
- [23] 钞小静,任保平. 新发展阶段共同富裕理论内涵及评价指标体系构建[J]. 财经问题研究,2022(7):3-11.
- [24] 范从来. 益贫式增长与中国共同富裕道路的探索[J]. 经济研究,2017(12):14-16.
- [25] 万海远. 共同富裕的改革路径与推进逻辑[J]. 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3):23-34.
- [26] 李军鹏. 共同富裕:概念辨析、百年探索与现代化目标[J]. 改革,2021(10):12-21.
- [27] 刘培林,钱滔,黄先海,等. 共同富裕的内涵、实现路径与测度方法[J]. 管理世界,2021(8):117-127.
- [28] 刘渝琳,王雨豪,朱鑫城. 共同富裕目标下可持续经济福利结构均衡增长[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2(5):3-24.
- [29] 江亚洲,郁建兴. 第三次分配推动共同富裕的作用与机制[J]. 浙江社会科学,2021(9):76-83.
- [30] Weisbrod B. A. Toward a theory of the voluntary nonprofit sector in three-sector economy [M]. New York: Russel Sage, 1974.
- [31] Hansmann H. B. The role of nonprofit enterprise[J]. Yale Law Journal, 1980: 835-901.
- [32] Wuthnow R. Between states and markets: the voluntary sector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 [33] Osborne D. Reinventing government[J]. Public Productivity & Management Review, 1993: 349-356.

- [34] 莱斯特·萨拉蒙, 赫尔穆特·安海尔. 公民社会部门[M]//公民社会与第三部门.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 [35] 韩保江, 韩心灵. 公共产品供给与经济增长: 影响机制与实证分析: 基于31个省级面板数据模型[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17(5): 157-168.
- [36] 黄利文, 沈晖.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中的市场失灵[J].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6(11): 207-212.
- [37] 李玉双. 大国公共产品供给优势及其影响[J].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7(6): 23-29.
- [38] 冷功业. 中国公共物品非营利组织供给研究[D]. 成都: 西南财经大学, 2010.

## The evaluation and selection of the supply mode of social livelihood public goods under the goal of common prosperity : A new classification based on empirical analysis

Zhou Weimin<sup>1,2</sup>

(1. School of Business, Ludong University, Yantai 264025, P. R. China ;

2. School of Economic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P. R. China)

**Abstract:** The principal contradiction facing Chinese society in the new era has evolved into one between the people's ever-growing needs for a better life and the inadequate and unbalanced development. This means that in the current stage, the process of realizing common prosperity in China is about enabling the public to comprehensively share diverse public goods.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in 31 provincial regions of China, this paper empirically analyzes the impact of social livelihood public goods on variables such as the public demand gap and the proportion of general public expenditure. According to the empirical results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ivelihood public goods, such goods are divided into two types: public goods that do not expand the public demand gap and those that do. The former is characterized by a rough balance between the government's budgetary expenditure and fiscal revenue allocated to these public goods, yet it will drive up the government's general public expenditure, such as pension and social assistance. The latter is distinguished by government budgetary expenditure for these public goods exceeding fiscal revenue, while it exerts no upward pressure on general public expenditure, such as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as well as medical and health servic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se two and general public expenditure reveals that the former demonstrates stronger public goods attributes. Based on an analysis of the suppliers of these two types of public goods and their interrelations, and taking the supply of public goods such as medical and health services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s a case,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the former may be primarily provided by third-sector entities, while the latter should be mainly supplied by market enterprises. This paper classifies livelihood public goods into two major types according to empirical results, which provides beneficial enlightenment for the proper selection of public goods supply subjects. The classification would be helpful to choose the appropriate public goods supply mode, improve supply efficiency, and promote the realiza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For livelihood public goods, how the market or third-sector entities can effectively participate in their supply requires government departments to provide efficient guidance by means of public expenditure and other tools. It also requires the government to leverage robust administrative measures to effectively enhance the coordination among the three parties, thus establishing a cooperative mixed supply model involving the government, the market, and third-sector entities. This will ultimately address the demand for livelihood public goods and steadily advance the achievement of common prosperity. The government should grant sufficient fiscal and administrative powers to third-sector entities engaged in public goods provision to support their development, and set clear standards and norms for public goods supplied by market enterprises.

**Key words:** common prosperity; supply of public goods; classification of public goods; NPO

(责任编辑 彭建国)